铃声远去入梦长

■赖大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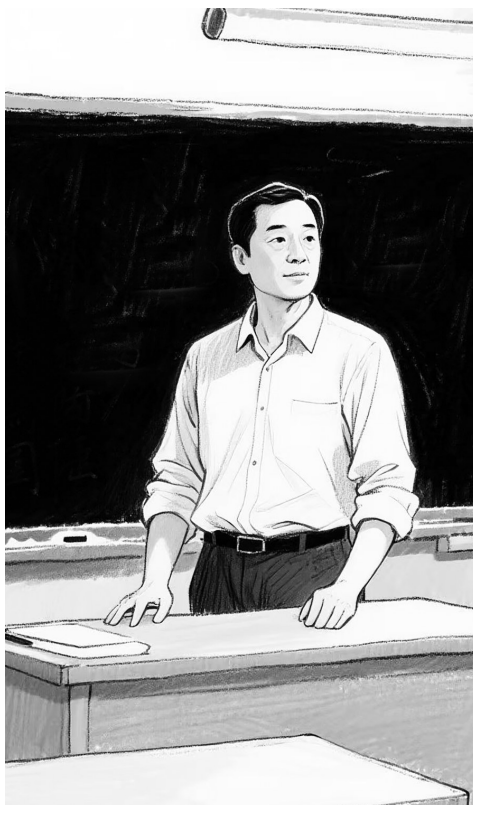
不知不觉,离开教育系统已十三载,但许多同事、朋友依然习惯叫我“老师”。这声称呼像一条剪不断的脐带,永远系着那段执教生涯,让我觉得自己从未与教育真正走远。

这几年来,唤我的称呼五花八门,赖主任、赖委员、赖作家……但最熨帖我内心的,仍然是“赖老师”。“老师”二字,就像融入了我的生命血液,注定要在我身躯里流淌一辈子。

22年前,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镇上的中学任教,开启了教学生涯。那时的日子,像山涧里的流水一样平淡而清澈。风华正茂的年纪,内心像有一团火在燃烧,站在讲台上,总担心课堂讲得不够透彻,生怕遗漏了知识点,每一堂课都得攥起十二分的认真,恨不得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一股脑地倒给学生。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那些年的教学经历,让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教育是良心活”。作为语文老师,就得像一个“杂家”,天文地理、九流三教,啥都要了解一些,才能把语文课讲得活色生香。而若缺少职业良心,语文课又是很容易“混”的学科,你可以照本宣科,一言堂、满堂灌,45分钟的课堂不过是走个过场,但效果可想而知。真正有良心的教育工作者,心里装着的是每一堂课的质量,关注的是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课前要把知识点嚼透,把教学设计磨细,绝不上“无准备之课”;课上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回应学生的疑惑与思考。说到底,教育这活儿,拼的从来不是技巧,而是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心。

教学生涯那几年,我最难忘的有两年,学校好几位女老师接连休产假,语文老师一下子捉襟见肘。校长找到我,语气里满是信任:“语文老师中,数你年轻,又有高三经验,只能辛苦你挑挑担子,带三个班的语文了。”我没说一个“不”字,肩上的担子陡然重了,心里也多了份责任,总怕辜负了学校的信任。那两年,我天天像陀螺一样连轴转,上午两节课,下午一节课,从高一讲到高二,课堂上的声音从清亮到沙哑,最后成了习惯性的低沉。日子久了,咽喉炎的病根也就落下了,但我至今没有一点遗憾。而今,那些在讲台前喊哑过的嗓音,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却成了我教学生涯里最珍贵的注脚。



人生很奇特,有时命运的齿轮轻轻一转,人生便拐向了另一个天地。2012年底,县里的政法单位在教师队伍中遴选工作人员,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经过笔试、面试、体检、考核,没想到竟然考上了。命运就这样阴差阳错,我告别了十年教学生涯,转身踏进了机关单位的大门。

这些年,在机关单位上班,工作重重复复,枯燥繁琐,从年富力强到老眼昏花,忙忙碌碌间,竟已年近半百。每当心力交瘁,焦虑来袭,常在失眠的夜里,一遍遍回望来时路,最怀念的依旧是那段纯粹的教书时光。

是的,那段教书时光,让我收获了桃李满枝的欣慰。每逢教师节,总还有学生给我发来祝福短信,再忙我都会回复一句“感谢惦记”,不敢辜负他们穿越时光的牵挂;去医院检查身体,撸起袖子抽血,一声“老师”,发现抽血的护士是当年的学生,瞬间觉得有股暖流顺着血管漫了上来;去某窗口单位办事,把材料递过去,发现办事员也是当年的学生,沟通立刻变得顺畅了……这些瞬间,就像一朵朵惊艳的小花,不经意间在我寻常的日子里开放。

铃声远去入梦长。不知多少次,我又梦见自己站在熟悉的讲台,挥斥方遒,言笑晏晏……醒来,一室漆黑,一声轻叹。

【雕刻时光】

重游是个哲学问题

■石华鹏

一

8年前,我到访过荆州古城、荆州博物馆。

18年前,我登上坛子岭俯瞰过三峡大坝,并在大坝上走了百来米。

30年前,我游览过宜昌的三游洞。

2024年11月中旬,我故地重游这三处地方。时过,境未迁;景是,人已非。再一次来到荆州古城和荆州博物馆,再一次登上坛子岭,再一次游三游洞,许多的记忆,许多的场景,许多的人和事,许多的慨叹……在交错的时间(当下与过去)和变换的空间(此处与他处)里交织,缠绕,如一堆被顽童扰乱的毛线团,花花绿绿地浮现在我眼前。

这便是重游的幸福——你内心所经历和获得的,比你眼前看到的多得多。

如果说初游是一种陌生的惊奇的话,那么重游可看作一种熟悉的慨叹。这有点像人生的感情历程,初游如恋爱,重游似婚姻。初游一地时那种期待、惊喜,以及“观看”的激情都写在脸上和眼睛里,相看两不厌;重游时,那种我曾来过的熟悉和平静代替了陌生的新鲜感,老夫老妻似的,但彼此能看得更细致更入微,有更深入的理解。

荆州古城墙依旧,门楼巍峨,城墙蜿蜒伸展,古朴而厚重。我今日再来,与8年前来未必有什么变化,毕竟脚下是500多年前的老城墙,一些著名战斗诸如三国中赤壁大战、夷陵之战发生于此,时间在这里变得无足轻重。高大坚固的墙体、精巧的瓮城、暗藏的藏兵洞等作为一项存在上千年的大型军事防御工事的构成要件,为这座古城赢得了“铁打荆州”的美称。防御功能丧失之后,如今,这座古城墙成为一段可以直接触摸的“历史肌体”,供人们怀想历史之用。当然,8年后变化还是有的,当年站在门楼上可以看到古城东南侧那尊巨大的金黄色关公铜像,今日看不到了,因为超高违建在前两年搬迁走了。老实说我并不喜欢那尊簇新的关公像突兀地进入我的视野,我更喜欢站在门楼上看荆州大平原上那种“气蒸云梦泽”的烟雨迷蒙和“忽忆故人天际去”的遥远空阔。

荆州博物馆再看也不厌。8年前曾惊叹过的一些充满无限想象力的漆木物件和各种形制精美的古玉摆在展柜里,重新与它们面对面,依然让我流连忘返。漆木彩绘虎座凤鸟悬鼓、漆木彩绘蟾座凤鸟羽人、人执龙形玉佩、人乘龙形玉佩,等等,都是令人惊艳的国宝级文物,它们来自两千年前的楚国,那是多么伟大的想象力。重游让我有了自己的选择,急匆匆走到上次没有看够的展品前,细细品味,感受楚人的智慧和艺术天分。

二

到宜昌,不能不去看三峡大坝,因为它目前还保持着两项“最大”纪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和清洁能源基地,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工程项目。18年前的2006年,我接到撰写“三峡大坝选址地质勘探纪实”报告文学的任务,在一年中最热的七月来到三峡大坝。那篇文章中记下了我当年看到大坝时的感受。

“三峡大坝进入我眼帘的一刹那,像舞台上亮相的主角,留给我记忆中惊鸿的一瞥,它比出现在任何媒介中的影像都来得真实来得气派。太阳的白光洒满坛子岭景区,也洒满三峡大坝。从这里望去,大坝像一帘巨大的瀑布飞流直下,我不知道,如果大诗人李白光临此地,又会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比喻来呢。”

“从坛子岭下来,我去了纪念品商店,我选中了一块三峡石留作纪念,这块三峡石黑白相间,磨成不规则的圆柱,圆柱表层有一些相互交叉的纹理,像一群正在作业的大坝勘探者。我对这块三峡石爱不释手,我钟情它,是因为它来自三峡大坝坝底,它是大坝基石的一分子,更是因为它纹理组成的好看图案,我相信,它就是无数大坝勘探者留下的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

18年后,我又来到了坛子岭,同一帮文友说说走走,三峡大坝好像变小了,小成了照片里的精致模样。再次凝视它,似乎没有了当年的激动和震撼,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朋友说可能是你变“大”(老)了,见识多了的缘故。我留意了一下,坛子岭纪念品商店已没有出自坝底的三峡石出售,可能库存卖完了吧。另外,出于安全考虑,行走大坝坝顶的游览项目也取消了,我们没法再去坝顶踩一踩混凝土坝面,像当年那样去验证一下是否结实。

三

重游宜昌城西北郊的三游洞,等于是“重游”我的青春岁月。

30年前,1995年,我20岁,在宜昌一所小学实习。青春的日子如富翁手中的钞票,感觉挥霍不尽,总计划着去这里那里玩儿。初夏的一个周末,我、海波、朱霞、张琼四位同学相约游三游洞。今日重来三游洞,我已50岁,一面随着队伍缓慢行走,听一位时常冒出英语的导游激情讲述三游洞的文人往事,一面回想我们当年四人游三游洞的情形。记忆如毛玻璃一般模糊混沌,除了想起我们四人均刻意穿着四种颜色、款式相同的格子衬衣外,游览的具体情形和细节我都想不起来了。待我重走一遍景区,记忆部分复活,挂在山腰上的小路、下牢溪的绿、刀削般险峻的山崖、文化名人的碑刻、张飞擂鼓台才有了印象——我来过这里,至于我们四人说了什么玩了什么没有任何记忆,唯有记忆的是大家一路嘻嘻哈哈,也不关心三游洞的文化故事以及什么美景,只有年轻的四张笑脸一直笑在我的记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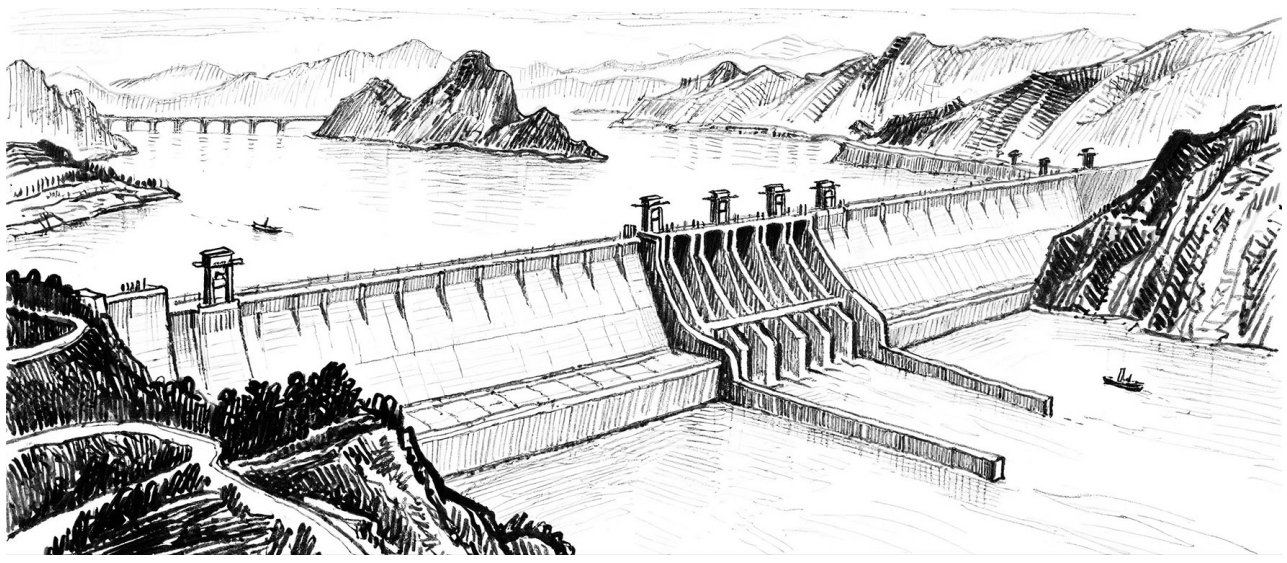
离开学校后,我没再见到朱霞和张琼,不知道她们的现状。海波先在宜昌,后去了珠海,我先在沙洋,后来到武汉求学,再到福州,我和海波时有联系,偶尔也见一面。这就是人生吧:相聚,分离,遗忘,怀想。

此番重游三游洞,我们30年前的故事已经模糊,而1100多年前的故事却清晰起来。唐元和十四年(819),大文学家白居易及其弟白行简与好友、诗人元稹,于各处赴新任途中偶遇夷陵(宜昌旧称),发现并首游此洞,并由白居易作《三游洞序》以纪之,三游洞由此得名而来,已历经1105年。三游洞是文人之洞——三位大诗人同游之地;是友谊之洞——三位挚友因偶遇而游;是探险之洞——三人在江上船中畅饮时发现山崖间的洞,舍弃棹杖而登入;也是离别之洞——三人在洞中过了一夜,“通夕不寐”,因为天亮就要离别。如此胜景,如此情谊,很是不舍,三人孤蓬漂泊,不知以后还能见否,很是伤感。

8年、18年、30年,当我在返回福州途中细数这些数字时,我竟有些怀疑这些时间是否曾在我身体里刻下过印记?如果有,那些时间背后的故事为何寻不得?如果没有,那些不可捉摸的片段为何又在记忆中显影?毫无疑问,重游这一行为让我陷入了时间、空间、存在和身份认同的疑惑之中。

重游一地,有些问题被自然地激发出来:时间是否改变了事物的本质?记忆如何影响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当一个人回到过去的地方,他会发现自我和周围环境都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个体的过去与现在如何相互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难有答案,但思考它们,会丰富我们的灵魂。

由此看来,重游不仅是个有关个人记忆、情感体验的人生问题,还是一个有关时间与记忆、身份与存在的哲学问题。



季珊珊/图

【瞬间感悟】

水的三重救赎

——读一笔《走近那条河》

■傅翔

翻开一笔的中篇小说《走近那条河》,扑面而来的并非清冽水汽,而是混合着“泥土和水草”的浓郁涩香——这萦绕在主人公丁思河感官中的诡异味道,如同一道缠绕命运的符咒,开启了一场关于河流、人心与文化根脉的深邃叙事。这位深谙现实肌理的作家,以水利专家丁思河的浮沉际遇为棱镜,折射出生态治理的艰巨、知识分子的困境,以及历史传承的幽微光芒。

小说源于作者一次深入的立法调研,它以治水工程为经线,以人性褶皱为纬线,在“工程治水”向“生态治水”的转型中,完成了一次对时代精神肌理的细腻勘探。正如作家在创作谈中坦言,自己的专业与职业“都与‘治水’有相当的距离”,却因立法调研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得以穿透技术壁垒直抵事件核心。这种创作起点的“陌生化”,反而成就了小说独特的叙事张力——既有水利工程的专业质感,又不失文学的人文温度。

小说以一场迟到拉开序幕,省水科院院长丁思河在“内河整治”庆功会上的恍惚与异象,成为命运陡转的预兆。技术功臣突遭调离,从治水一线贬至清冷的水志办,表面是常规人事变动,内里却涌动着权力博弈的暗流。作者一笔以精准的洞察力,将丁思河的困惑、不甘与坚韧层层剥开。

作者匠心独运地赋予丁思河“看见味道”的超感知能力。会议室弥漫的“涩香味”,如影随形,成为他精神焦虑与命运隐喻的外化。更精妙的是“身份错位”的反复运用:铁口巷老妇固执地称他为“市长”,这误认绝非闲笔,它撕开了技术官员身份的面纱,直指为民担当的精神内核;而江枫与吴曲容貌气质的神似,则如镜像般映照出丁思河深埋的情感遗憾与道德自省。这些手法模糊了现实与心理的边界,使丁思河的内河治理历程,同步成为一场穿越权力迷宫与情感迷障的心灵溯源。

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将“生态治水”的理念转化为对存在本质的思考。丁思河能“看见味道”的奇幻设定,实则是一种认知范式的转变:从工程思维的量化评估,到生命视角的质性感知。那股挥之不去的“涩香味”,既是被污染的河水发出的隐喻性抗议,也是现代性进程中人与自然疏离的嗅觉象征。

作者在创作谈中提到的“变‘工程治水’为‘生态治水’”的顿悟,在小说中升华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吴曲讲解《丹青魂》时强调的“画圣在天堂与地狱间的挣扎”,与丁思河在治水过程中的道德困境形成镜像。当技术权威遭遇老依姆的生存困境,当项目招标背后的权力博弈浮出水面,小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治水不仅是治理水体,更是治理人性的贪婪与短视。

小说中,“水”的意象被赋予多层次的救赎意义。最表层是看得见的“生态救赎”——根治黑臭水体,重现“青山、碧水、蓝天相映成辉”的滨江盛景。更深一层则是“人心的救赎”:丁思河在权力倾轧与世态炎凉中(如亲密下属唐义山的疏远),被迫退守文献编撰的“后方”。然而,正是这看似边缘的《江城内河文献书目提要》工程,使他跳脱一时一地的得失,在历史纵深中锚定了工作的永恒价值。

《走近那条河》最终呈现的,是一条完成了三重净化的河流:自然之河重现清澈,人心之河在历练后趋向澄明,而文化之河则在文献的汇集与传承中奔涌不息。丁思河站在水志办的窗前,目睹年轻的邱文投入文献编撰的身影,那曾经困扰他的“涩香味”终被辨识——那原是融于血液的、内河的生命气息。作者一笔以其沉稳深邃的笔触提醒我们:真正的“治水”伟业,不仅在疏浚河道、净化水质,更在修复人心与社会生态的平衡。

当黑臭的冬青河恢复流淌,当厚重的文献集终获出版,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技术官员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责任如何穿越沉浮、理想如何于边缘处扎根、文化如何成为永恒堤坝的启示录。在生态危机与精神困顿交织的时代,《走近那条河》如一股清冽而深沉的水流,冲刷着我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唯有将技术的理性、人心的温度与历史的担当汇流,才能滋养出一条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

《走近那条河》的价值,在于它将一个地方性的治水故事,书写成一部关于存在与救赎的现代寓言。一笔以立法调研的扎实功底为骨,以文学想象的灵动为血,让那条被污染又重获新生的河流,成为时代精神的镜像。当我们跟随丁思河的脚步走近那条河,实则是在重新学习与自然对话、与传统和解、与自我坦诚相对。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条等待被治理的河流,都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的生命本身。

【书林漫步】

怒放的盛夏

■刘玮祥

夏日的阳光是炽热的,还有些毒辣,但这是万物生长最关键和必经的季节,鲜花为之盛开,水果迎来成熟季,学娃们也陆续开启收获。

记得1994年5月底的周三中午,一场意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个年代,生活在农村的我们大部分家境贫穷,自耕自给的粮食是没有办法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售卖茶叶、家禽是增加收入最便捷的方式。家里兄弟姐妹5个,我排行老大,书念得不错,上完村小,仅12周岁就到6公里开外的另一个村办中学寄宿,三十几个人睡一个大房间,自带咸菜(萝卜或腌制盖菜)配着蒸饭,成了寄宿生最通用的生活方式。菜一定要咸要炒干,不然三四天后,菜罐里就可见白白的一层细绒毛,有时还会发出酸臭味。可能是太饿了,或者是对这味道不太敏感,带到学校的咸菜大部分还是进了我的肚子里。冬季带份新鲜青菜,可谓加餐。

5月初,正是安溪铁观音春茶上市的季节,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连续采摘了几天,请堂亲帮忙加工烘焙后,拿到集市上销售,换来了百八十元。母亲挂念正上初三的我,天未亮就跑到村里的猪肉铺等候,精心挑选了一斤瘦肉(3元左右),切成小方块,装在塑料袋里,和着前几天刚从婚宴现场拿回来的两粒糖果揣进口袋。她顾不上早饭,就快步走到我的中学。母亲到学校,我们刚参加完早读。母亲的到来,我一开始是惊讶的,害怕家里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看到母亲抖动塑料袋里的瘦肉,我瞬间跳了起来,太久没吃到肉了。

中午,我从学校食堂借来一个铝制小汤盆,就着学校厨房煤炉煮起了瘦肉片汤,闻着徐徐飘来的土猪肉味,激动不已,恨不得马上把整盆鲜美的肉片汤倒进肚里。我迫不及待地端着滚烫的肉汤往宿舍走去,“嘣”的一声,“哇”的哭声紧跟其后。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飞奔进食堂,可能是没注意到低头走路的我,两人撞了个满怀。肉没吃上,我的脸却被滚汤烫得通红,水泡缓缓起来。这一刻,我的世界暗淡了下来,距离中考仅剩15天。

没有意外,原本可以考上县城中学的我以0.5分之差落榜了。因为身高不足1.5米,那个年代最流行包分配的师范学校,也把我拒之门外。乡镇高中成了我唯一的归属。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属侨办完中,也曾辉煌,但地理位置偏僻,曾经多年高考“剃光头”。记得报到时,刚师专毕业分配来的班主任谢老师摸着我的小脑袋,打趣地说:“这个小朋友也要上高中啦?”班级第一排中间第一桌,成为我三年最固定的位置。天没亮,我就在晨曦中或路灯下与文字共舞,深夜是教室灯光的免费“节能师”,年段前三名也是我最固定的排名。

没有意外,那年高考,我成了这所乡镇高中唯一通过本校学习考上大学的。记得放榜那天,我还在田里割稻谷,稻叶飞舞着在我的大腿上雕刻着岁月,小飞虫不厌其烦地诉说着与稻子的别离。四叔公家的电话铃声打断了田间劳作的节奏,谢老师来电说,我被录取了。我成了族亲里第一个大学生。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我随后对着空旷的田野发出了最响亮的吼叫。族亲们奔走相告,相互庆祝,洋溢着喜悦,这份期许已经等待太久了。随后几年,家里陆续走出了几名大学生。

没有意外,我顺利地从大学校园走了出来。在盛夏与柔秋交替的季节,我选择了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道路,放弃了优越的银行岗位,带着儿时的梦想走进了军营,在投笔与握枪中转换,在走进田野、厂房与空调房中思索轮转,工作岗位也从基层乡镇向县直、省城部门调转,但那颗追求梦想、静待花开的恒毅之心从未改变。

今年,妹妹的孩子参加完高考,上了本科线,但未能录取到意向学校,想复读,来找我商量。看着孩子沮丧又无奈的面容,我温和地劝说:“雨过必会天晴,天晴自会雨来;只要梦想还在,这个夏天没有盛开,下一个夏天必将怒放。”

【坊巷里弄】